

试论新见晋侯簋的归属

张懋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 勇 (西安市文物保护中心)

摘要: 新近见到一对晋侯簋, 形制、铭文相同。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铭文内容分析, 其时代应为西周共懿时期。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 可知这两件晋侯簋的主人应是成侯服人。

关键词: 西周; 晋侯簋; 成侯服人

中图分类号: K87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4-0040-03

最近在成都见到一对晋侯簋, 因为与 1990 年代山西曲沃、翼城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铜器群有关, 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这一对晋侯簋仅存器身, 器盖不知何处。形制、纹饰、铭文相同 (分别以甲簋、乙簋命名) (图版叁、肆)。通高 16.2、最大腹径 24.1、口径 19 厘米。子母口, 圆鼓腹, 圈足较高, 双耳上端有兽首, 下有垂珥, 腹部饰瓦棱纹。器内底铸铭文两行 14 字, 又重文两字 “晋侯乍 (作) 旅宝簋, 其孙 (孙) 子 (子) 万年永宝用。” 器形饱满, 纹饰简洁, 文字清爽遒劲, 红斑绿锈, 质地上佳, 不愧为国君之器。

这两件晋侯簋是西周中晚期流行的双耳圈足簋, 属于王世民等先生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所分的 I 型圈足簋的第 3 式。^[1] 同于此式的簋有贤簋 (《集成》4104 ~ 4106)、友簋 (《集成》4194) 以及我们前几年看到的一件仲釐父簋。在《仲釐父簋赏析》一文中, 我们指出: 这些簋上所饰瓦楞纹 (亦称 “平行沟纹”), 虽然它早在商代晚期的九象尊的圈足上已经出现, 但极为少见, 且只是辅助纹饰, 它作为主要纹饰流行起来, 是在西周中晚期。较早的瓦楞纹簋有通簋 (《集成》4207)、贤簋、友簋等。唐兰先生将通簋、友簋置于穆王时期, 可从。^[2] 但他将贤簋放在成王时则不妥。《西周青铜器分期

断代研究》认为是西周中期偏早时器, 理由比较充分, 可将其放在穆王时。仲釐父簋的铭文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其字形书体与友簋、贤簋、通簋十分接近, 所以仲釐父簋的年代应在穆王前后。^[3] 在这几件铜器中, 通簋是标准器, 铭文中 “穆王”, 友簋、贤簋、仲釐父簋大致与通簋年代接近, 恐怕不会晚于共王初年。将晋侯簋与它们作比较, 似乎要略晚一些。虽然它们都是瓦楞纹簋, 但仍有区别。晋侯簋的半环耳的耳孔较上述诸器大, 圈足下端的台阶也稍高。试将西周中期的瓦楞纹簋与晚期的瓦楞纹簋作比较, 前者瓦楞纹的沟槽比较浅, 而且瓦楞纹的形态也有差别, 而后者瓦楞纹的沟槽比较深, 形态也比较统一, 是知前者处于发展阶段, 后者已经成熟。像友簋、贤簋、通簋的瓦楞纹的沟槽就比较浅, 而且友簋、贤簋的瓦楞纹的间距也不完全等同, 腹部中间的沟纹较宽, 起伏较平缓, 这是早期纹饰的孑遗。晋侯簋即属于后者。同时晋侯簋与仲釐父簋也有区分, 如仲釐父簋双耳作凤鸟形, 这种形式的簋耳通常年代较早, 在昭穆时期。总之, 晋侯簋的年代比以上诸簋的年代要稍微晚一些, 大致在共懿时期。

从字形书体看, 晋侯簋有西周中期金文的特点, 字体大小及笔道粗细一致, 清爽秀美。查其 “宝” 字, “贝” 字下开口, 无两小竖, 但细看,

两件晋侯簋铭文写法略有区别,甲簋“贝”字中间一横画与其上的两条短斜线相连,而乙簋“贝”字中间一横画与其上的两条短斜线不相连。与甲簋“贝”字写法相近的有庚赢卣(《集成》5426)、盂方尊(《集成》6013)、师虎簋(《集成》4316)。我们曾经论证庚赢卣为穆王时期^[4],只是庚赢卣“贝”字下开口较大,且宝盖头的横画两头有点出檐,写法原始,是知晋侯甲簋年代要晚于庚赢卣。学术界倾向于认为盂方尊是穆王时期,师虎簋则要晚一点,到共王时期,而仔细体味,晋侯甲簋铭文字形书体比此二器还要晚一些。乙簋“宝”字的写法则接近友簋和七年趯曹簋。七年趯曹簋为共王时标准器。总而言之,从铭文字形书体分析,晋侯簋宜放在共懿时期,这与形制、纹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晋侯簋失盖,承蒙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报告,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去年收藏了两件晋侯簋盖,因残碎正在修复中。经过初步核对,它们应属同一组器物,这两件晋侯簋与北大的两件簋盖是否为原配,现在还不能形成定论(我们认为是原配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为原配,这位晋侯也不止这两件铜簋,他至少应拥有四件铜簋。那么这两件晋侯簋究竟出自山西曲沃、翼城晋侯墓地的哪一座晋侯墓呢?

我们注意到这两件晋侯簋的铭文中没有晋侯字样,却没有晋侯的私名。根据李伯谦等先生的研究,年代较早的 3 组晋侯墓即 M114(晋侯燹父)、M9(武侯宁族)、M7(成侯服人)出土的晋侯器上不署晋侯名字,而不同于其他组墓葬晋侯器均署晋侯之名的行文格式。^[5]

考虑到新见晋侯簋的形制与铭文均早于 M33 所出棘马铜器,而且自 M33 开始晋侯器上才有晋侯的私名,所以新见晋侯簋的归属只能在早于 M33 的三座晋侯墓葬中寻找。

令人兴奋的是 M114 中也出土了一件瓦楞纹铜簋。此簋残损严重,敛口,鼓腹,圈足,失盖。器体饰瓦纹。口径 20、最大腹径 26、通高 15 厘米。因为这是修复后的数据,与原器自然稍有差异,即使如此,其尺寸、铭文与本文所论晋侯簋也比较接近。如前所言,无论是形制还是纹饰,这种瓦楞纹簋都要早一些。李学勤先生已

经指出它有别于西周中期以下的环耳瓦楞纹簋。^[6]可以与 M114 同组的 M113 所出猪尊上的铭文作比较,其铭曰“晋侯乍(作)旅飢。”^[7]字形明显要早于本簋,所以本簋不可能出自 M114 中。目前一般研究者认为 M114 是晋侯燹父的墓,年代在昭王时期。

M9 是武侯宁族的墓,在穆王或穆王前期。与 M9 同组的 M13 出土一件晋侯温鼎,其铭曰:“晋侯乍(作)旅鼎。”字形与本簋比较接近。同出一件晋姜鼎,其铭曰“晋姜乍(作)宝簋。”其中宝字写法与本簋接近,不过细加分析,似乎略早于本簋。M7 被盗严重,随葬器物几乎被洗劫一空,无从对比。左右权衡,本文所论两件晋侯簋很可能出自 M7,换言之,这两件晋侯簋的主人是成侯服人。

综上所述,成都华通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晋侯簋的发现,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两件晋侯簋虽然缺失器盖,但器体周正,纹饰棱角分明,在众多瓦楞纹双耳圈足簋中也属上品,且有十余字的铭文,字形工稳,格调高雅,弥足珍贵。

其次,经论证,这两件晋侯簋应出自山西曲沃、翼城晋侯墓地的第三组墓葬 M7,从而有助于复原这座晋侯墓的青铜器组合形式,也为进一步了解晋侯墓地的墓葬排序与器物年代特点提供宝贵的资料。

第三,为瓦楞纹双耳圈足簋的断代提供了新资料。由于瓦楞纹的线条比较单一,变化不多,差异较小,无疑给断代带来一些困惑。如果这两件晋侯簋的主人是成侯服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通过与 M114 中出土的瓦楞纹铜簋的比较研究,通过与其他传世瓦楞纹铜簋的比较研究,就有可能大致梳理出瓦楞纹双耳圈足簋的发展线索。第一期以 M114 中出土的瓦楞纹铜簋为代表,年代在昭王时期。第二期以仲釐父簋、通簋、友簋为代表,年代在穆王时,有可能下延至共王初年。仲釐父簋的凤鸟形簋耳很有特点,鸟的喙贴着颈部,似乎在休眠,比较内敛。而较早的立鸟形簋像簋(昭王时期),鸟首高昂,鸟的喙与颈部分离,比较灵动。当然这两种立鸟形簋耳在穆王时有一段并行的时期,如灵动型的簋与

内敛型的录簋都是穆王时器，不过前者出现早，后者要晚些，而且内敛型凤鸟形簋耳不见于穆王以后铜器。第三期则以本文所论晋侯簋为代表，时间在共懿时期。由于有年代比较明确的而且前后相互连接的晋侯墓群作依托，以上结论便有一定的可靠性。而这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断代也将产生积极意义。

由于晋侯墓地 M7 被盗严重，其他晋侯墓的部分青铜器尚未修复，资料也未完全公布，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困难。本文的论说难免有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附记：在本文写作中，承蒙徐天进教授提供晋侯墓地相关信息，谨表谢忱。

注释：

[1] 王世民等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年。

[2] 唐兰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 336、329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3] 张懋镠、王勇 《仲虺父簋赏析》，《上海文博论丛》2008 年第 4 期。

[4] 张懋镠、王宏 《芮公簋盖识小——兼论垂冠大鸟纹》，《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 年。

[5] 李伯谦 《晋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6] 李学勤 《谈叔父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 年第 10 期。

[7] 上海博物馆编 《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

(上接第 39 页)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 年增刊。

[6] 蒋成、陈剑 《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 年第 3 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 2000》，科学出版社，2002 年；蒋成、陈剑 《2002 年岷江上游考古的收获与探索》，《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4 期。

[7] 江章华 《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2004 年第 3 期。

[8] 陈卫东、王天佑 《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四川文物》2004 年第 3 期。

[9] 同 [3]。

[10] 林家遗址报告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但笔者认为晚期尚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林家遗址第 3 层下的遗迹单位，后段为第 3 层。

[11] 资料现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考古》2005 年第 7 期。

[12] 同 [1]。

[13] 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武都县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

[14] 蒋成、陈剑 《2002 年岷江上游考古的收获与探索》，《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4 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16] 同 [1]。

[17] 同 [1]、[13]、[15]。

[18] 王仁湘、叶茂林 《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 年。

[19] 何锟宇 《营盘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2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茂县波西遗址 2002 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 2004》，科学出版社，2006 年。

[2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川茂县沙乌都遗址调查简报》，《成都考古发现 2004》，科学出版社，2006 年。

[22] 同 [7]。

[23] 陈剑 《波西、营盘山及沙乌都——浅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变的阶段性》，《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5 期。

[24] 张强禄 《试论白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与川西、川北新石器文化的关系》，《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年。

[25] 同 [8]。



1. 晋侯甲簋



2. 甲簋右耳特写



3. 甲簋内底部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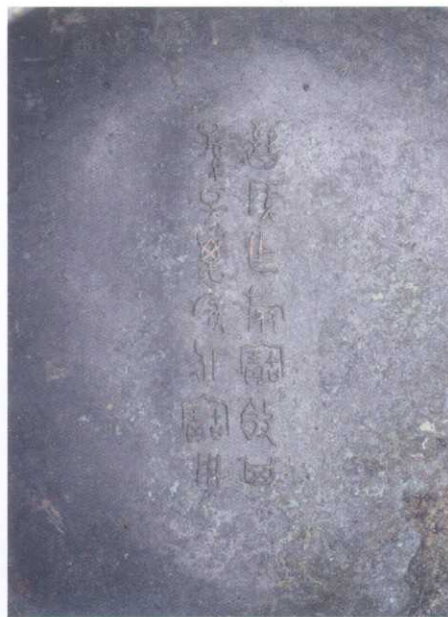
● 图版肆 晋侯乙簋



1. 晋侯乙簋



2. 乙簋右耳特写



3. 乙簋内底部铭文